

外國名家散文叢書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in a dark brown color,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斯坦貝克
日記選

百花文藝出版社

WAIGUOMINGJIASANWENCONGSHU

(美) 羅伯特·迪莫特 編

斯坦貝克日記選

選

鄒 藍 譯

選

百花文藝出版社



1230312

内 容 提 要

斯坦贝克系美国著名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曾影响一时，反映极为强烈。

本书集中收录了斯坦贝克在1938—1941年，也就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时期的日记。共分“前奏”、“一本书的日记”、“结局”三部分，这些日记反映了斯坦贝克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心路历程，表现了其创作过程的构思、想法、创作心理的调整，袒露了斯坦贝克丰富的内心世界。编者并在每部分日记前加以评论，概括了每一阶段影响斯坦贝克生活和创作的人文环境。

这是一本独特的日记选，它为斯坦贝克的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打开了一个窗口，使读者了解到名著诞生前作家真实的自我。

斯坦贝克日记选

〔美〕罗伯特·迪莫特编

邹蓝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5 3/8 插页2 字数110 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06-0924-6/I·836

定价：4.10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目 录

前言.....	罗伯特·迪莫特 (1)
导言.....	(6)

第一部分 前 奏

评论.....	(35)
日记.....	(38)

第二部分 一本书的日记

评论.....	(43)
日记.....	(54)

第三部分 结 局

评论.....	(131)
日记.....	(140)

附录.....	(163)
译后记.....	(168)

2017/26

前 言

“……家除了在记忆的储存中已不复存在。”

——斯坦贝克：《与查理旅行记》

从约翰·斯坦贝克在1936年至1940年间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来看，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的郊区洛斯加托斯的高所是他一生中在写作方面最满意的了。在这，他写出了一系列佳作，其中包括《人与鼠》、《长谷》、《他们的血是热的》和《愤怒的葡萄》；他还目睹了《人与鼠》在纽约的剧场常盛不衰以及好莱坞根据《愤怒的葡萄》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佳作；他进行了必要的旅行和研究，以写作非小说类的散文《科尔特斯海》；他应征入伍，帮助制作了纪录片《被人遗忘的村庄》。只要他愿意，荣誉、奖励、名声都会飞来，可是他在洛斯加托斯居住期间，却没有持久的个人幸福和彻底的归属感。

尽管他在文学上有了空前的成功，但他在洛斯加托斯却以外来人居，就像之于我们一样，他未与当地融为一体。与他的出生地萨利纳斯或他的精神上的故乡蒙特雷半岛不一样，他在洛斯加托斯从未扎下根来，从未熟悉这一地方的布局。相反，他像一个旅居的人，对居住的地点很挑剔，越挑越远离市镇中心，就好像他太靠近近郊社会

的生活主流，他在30年代末写作的无所不晓的特点就会受影响似的。尽管他在作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生涯中，反反复复地提及萨利纳斯和蒙特雷，他对洛斯加托斯却是不同寻常地沉默。当然，在他的私人信件和这本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洛斯加托斯的评论，这几间房子是斯坦贝克夫妇第一个能买下的地产，他经常为这一所有权的含义感到不安，甚至感到尴尬，但是在他一生所写过的书中，只有自传性的《与查理旅行记》中有几处以赞赏的笔调提到洛斯加托斯。虽然成功的不良效果最终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洛斯加托斯的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却被导向内在的个人内心深处。斯坦贝克如此专注于他虚构场景的广阔地平线，如此执著地揭露他故乡有名的加州固有的巨大文化冲突，斯坦贝克似乎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出他最伟大的作品来。

斯坦贝克不抛头露面的习惯保持得很好，至少有一本洛斯加托斯的地方史中就根本未提及他曾在当地住过。除了洛斯加托斯和圣荷塞的报纸偶有提及，以及老住户的回忆外，斯坦贝克与洛斯加托斯的关系一直是不稳定，有点“模糊和不足道”的，正如一个老住户告诉我的那样，所幸现在报纸上关于他的文章多起来了，而以前一直到1980年中期的十年里，关于斯坦贝克就没有什么重要文章。尽管近来发表的关于斯坦贝克的传记中有着充足的资料，当地的传说仍局限于若干事实——他在当地住过两所房子，他在其中的一所房子里写了《愤怒的葡萄》（不过错以为是靠近山顶的布拉西路的寓所中写的）；他穿着很朴素，看上去就像是个体工；有时人们在市中心大街上看见

他和查利·卓别林、华莱士·福特、斯宾塞·特雷西在一起（一般又错了，误以为同时）；他和妻子卡洛尔都被看作是激进的波希米亚人，他们的酒窖中佳酿不少，搞狂饮宴宾客。这些就是他如今给洛斯加托斯留下的所有遗踪了；这种风闻传说不足以表明他在这里居住时的心路历程的深度，复杂性和强烈性。不过考虑到萨利纳斯和蒙特雷的部分地区无耻地利用斯坦贝克的盛名作招牌，这也许不太坏。斯坦贝克在1965年对英国记者赫伯特·克莱茨默戏语说，“一个作家最好在28岁时死去，^吧这样就有了发现他的机会。^吧如果他活得更长些，人们就只能对他进行再评价了。我宁可被发现。”

在许多原因中，去发现深藏着的斯坦贝克的动机促使我在1984年初去了洛斯加托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总是尽量不引人注目地住在邻近的草木茂密的圣克鲁斯山的临时寓所里。当我开着旧雪佛兰卡车从66号公路风尘仆仆向西开过来，开上这个小城的大街时，我意识到这是全美国最好的环境之一，我也觉察到斯坦贝克之所以被吸引到这一带居住的原因（卡洛尔则出生和成长于圣荷塞的纳格里公园区）。这地方太惊人了，风光绝妙，物产丰富，气候温和，跟加州大部分地区一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想完全欣赏到它的优点是不可能的。我像许多斯坦贝克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发现进入伊甸园要比离开它简单得多，我提醒自己迟一点感到满意，也比没有感到要好得多。现在也是如此。

不过作为外来人，也是有所收获的，因为它使人两眼一抹黑，而只好靠观察而不是参与，靠理解而不是获得。当

这座极为富有且多权贵的城市（它位于阿斯彭和新迦南之间）居民去经营商务之时，我却有机会获得一些另外的回报。我的住所大致等距离地介于约翰和卡洛尔夫妇在大约五十年前往过的两所房屋之间，那时他们决定避开蒙特雷的海岸雾气而享受圣克拉拉县西部清新的空气。从我狭窄的前阳台，向东可以看到塞雷诺山，阳光越过小山照射在斯坦贝克夫妇在洛斯加托斯住过的第一所房子那一带，格林伍德巷离我这里仅数哩之距。从我弯曲的后廊向南看去，就像他们在山顶附近洛斯加托斯的第二个住宅里曾听过的一样，能听到17号公路圣何塞与圣克鲁斯段上的汽车声，也许是满载着家人在日落海滩玩了一天回家去，或像我一样，从忙得够呛的硅谷下班回来。椋鸟、黄鹂和无数种蜂鸟到处来回地飞，使轻柔的空气也微微动了起来，可是汽车永不间断的隆隆声却永远也盖不下去。

有一次，我自己到萨拉托加山上的大盆地去郊游回来，在9号公路旁停了车，搭顺风车去格林伍德巷看了看。在一轮明亮的满月映照下，我站在橡树和野苹果树林中，想象着斯坦贝克在这里的情景，他狂热执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丰富了他那一时代的文学，振作了可怕动荡的十年的最后几年。一度，我看到了他的目标深沉的单一性：为写出最好的东西，他甘愿以他所有的一切冒险，在这一过程中，正面揭示在天堂的无情状况中人类的忍耐精神。就像许多有启发意义的关联语一样，这句关联语还是基本有效的，虽然其锋利性随着我再开车进入车流，并听到邻车音响中传出的歌声而在变钝。

现在似乎与过去一样，我能向作为作家的斯坦贝克索

取的，我们也同样可以向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家索求。有时，好像这本《愤怒的葡萄》日记还不够似的，在我想象中，我看到斯坦贝克子身一人，俯身在桌上，手中的笔疾速地动着，向他身边的空气采光，以“用光写满纸页”。我想这一瞬间，是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所经历到的最好体验之一，当然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

罗伯特·迪莫特

俄亥俄州雅典1988年6月

导 言

波瓦洛曾说过，王公、诸神和英雄们才是文学所适合表现的主题。作者只能写他所崇拜者。今日之王公并不太让人兴奋，诸神们度假去了，剩下的英雄是些科学家和穷人……但是穷人们还在空白之中。当他们奋斗时，如果失败，这个英雄的奋斗就会带来饥饿、死亡或监禁作为惩罚。我们人类崇拜英勇无畏，因此作者每见到大无畏便会表现它。他现在于奋斗的穷人中发现了大无畏。

——斯坦贝克1939年4月16日对全国
广播公司电台节目的谈话

约翰·斯坦贝克的最伟大作品《愤怒的葡萄》（纽约维京出版社1939年），1940年获普利策奖，主要因此书而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美国作家所写的最有生命力的小说之一。此书的写作，实际上与另一本书同期。小说本身是斯坦贝克于1938年6月至10月中，经过数次不成功的尝试后在持久的冲动下写就的。同时他还就这本小说的写作写了一本笔记，他每天记载，其中还令人喜出望外地包括

有他于1938年2月和1939年10月至1941年1月写的另外两段作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小说共售出1400余万册（现在每年还售出10万册平装本），被译成了地球上几乎每一种文字，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公认杰作。这是一本良心放对地方的小说，与另外两本同情美国下层人的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马克·吐温的《哈克布里·芬恩历险记》一样，《愤怒的葡萄》已进入了我们文化课程的必读书目。《愤怒的葡萄》获得了传奇般的声誉，约翰·斯坦贝克的名望在全球鹊起，但是这部三部分的日记，包含着这部小说创作过程的个人记录以及其令人震动的结局，迄今却几乎不为人所知。日记既能帮助我们理解小说家的创作方式，同时说明他的巨作赖以产生的纷乱的环境。

《愤怒的葡萄》是一部有争议的经典之作，因为它既是民粹主义之作，又是革命之作。这部作品推崇“普通人”的善良本性和坚韧并预言会发生根本的变革，产生出公平的社会条件来：“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饥饿人的眼里闪着越来越强烈的怒火。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并在那里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准备着收获期的到临。”这部小说部分是自然主义的史诗，部分是不满于现实的檄文，部分是浪漫的福音，它表述了复杂的人类经历，深为我们多样的民族感所认同；几乎每一个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或至少声称了解，乔德一家是如何从俄克拉荷马死气沉沉的尘暴带历尽艰辛地迁居到加州堕落的希望之地的。在他们

富有讽刺意味的从有家到无家可归，从个人主义到集体意识，从自私自利到群体的爱，“从‘我’到‘我们’”（第14章）的迁移中，斯坦贝克塑造的令人信服的角色——乔德大妈、汤姆·乔德，吉姆·凯西，沙伦家的露丝——已永远铭刻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不断地提示我们：英雄行为既是选择的结果，也是被选择的结果。同样，斯坦贝克对第66号公路——从美国中部至西部“人们逃亡的道路”（第12章）沿线风光的生动描绘，反映出国民对移居，对流动和盲目奋争的渴求。小说令人迷乱的结尾：沙伦家的露丝产下死婴后，将流着奶汁的乳头给一个濒死的陌生人吮吮，然后抬起头来“神秘地”（第30章）笑了起来。这个场景总也不能从我们的眼中消褪。只要哪里人们还在盼望一个充满尊严的社会，在其中人们可以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那里人们就能听到《愤怒的葡萄》的强烈的抗议声。《愤怒的葡萄》讲述的故事是破灭的幻想，挫败的希望，非人的遭遇和背信弃义交织在异常脆弱的希望之线上，它概括了大萧条年代富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在美国小说中鲜有与之匹敌者。

斯坦贝克的这部书被左派赞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胜利，被批评家和评论者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曾为罗伯特·M·拉福叶特参议员调查加州专制的农场中劳工的处境作过历史的见证，艾利诺·罗斯福也曾为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所折服（“其场景之惨烈……使你害怕……翻开下一页，可还是让你手不释卷，甚至不愿落下一页。”）但是《愤怒的葡萄》也曾被学究们认为多愁善感、不真实、无艺术价值而多次被校董会和图书馆列为禁书，并被右翼牧师、

农场主组织和政客们骂作不道德、下贱和胡说八道。（俄克拉荷马的赖尔·波伦众议员便像这本书早期的谩骂者那样，说这本书是“谎言，出自扭曲心灵的黑色炼狱般的虚构”）事实上，自从这本书于1939年4月14日出版这一天起，它与其被看作是小说，更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事件，一项受人拥护的政治事业或者是一项事实的个案研究。如果说过去五十年中人们对这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性质究竟如何很少共识的话，倒有许多证据表明，它在广泛的读者群中引起了各不相同的反响。或许这正是目的所在，因为斯坦贝克有意将小说分作“五个层次”，有意要把读者的神经“撕裂”，使他“参与现实”。他声称，读者从《愤怒的葡萄》中“所获”，“完全由读者本人参与的深浅所决定”。斯坦贝克的参与美学观使这部小说给广泛的读者打下了深刻的印记。通过根据同步发生的事件来构思小说，斯坦贝克将公认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疆域拓得更宽并重新定义了无产阶级的文学形式。与美国许多小说杰作一样，《愤怒的葡萄》没有提出一套解决方法，而是指出了信仰的途径和信仰的范围。

在引起争议的小说中最让人争议、最令人捉摸不定的这部小说背后，便是美国作家中最离群索居的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他的个人经历就记录在这部日记之中，它同样狂热地强调追求艺术完美的令人痛苦的历程。斯坦贝克的这本日记也是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冒失的开端、自我怀疑、唠唠叨叨的埋怨、偏执、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图、人物的颠倒以及从头至尾贯穿的脆弱、恢复清醒的线

条。与小说一样，这本日记也有其角色，这些人或多或少与斯坦贝克写作的时期有关。有些人的生活对他产生了影响，有些人的生活与他的生活重合，有些人与之并行，还有些像幻影般隐现，更有些人至今不为人所知而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流程中。在给小说留下过印记的人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以某种精神上合作者的身份，与斯坦贝克这个名字突出地联系在一起。若没有这两个人，这部小说或许会大不一样。

卡洛尔·亨宁·斯坦贝克（1906—1983）是小说家性格开朗的第一位妻子（他们于1930年结婚），她比丈夫在政治上更激进，甚至先于他就积极支持逃亡的农民运动人士。她本人也精力旺盛，多才多艺，她是诗人、讽刺作家、散文家、漫画家，而她放弃了她可能有的事业，以辅佐丈夫的事业。这种合作者关系与其说是基于极浪漫的爱情，更不如说是基于相互的需要和共同的感情。他们的婚姻，在斯坦贝克事业的奋争年代中，是很平静、平等的；由于《人与鼠》（纽约：科维奇——弗里德出版社，1937年）带来的巨大成功和压力，婚姻状况变得脆弱和不稳定了。卡洛尔是个性格极偏的人，她感情外露，常感到受挫折、很怨恨，也很妒忌；而约翰却过分羞怯，常被人围攻，常犯糊涂而又要求太多。三十年代后期，只要是约翰连续写作的日子里，卡洛尔虽并非总是乐意，还是承担了大绝大多数日常的琐碎事务，还尽量使丈夫不受无端的干扰并执行斯坦贝克与他的文学代理人之间的某些财务往来（这项差使越来越忙）。斯坦贝克在日记第45条中承认，“卡洛尔干得真不少”。卡洛尔还不时充当他的文化使者 and 代表。是卡洛尔而不是约翰去纽约参加了由约瑟夫·科

克兰改编得极不成功的剧本《托蒂亚平地》的首演式。就在这次访问中，她在1938年1月邂逅了记录片制片人帕雷·洛伦茨，并安排洛伦茨对洛斯加托斯的初访以便讨论由斯坦贝克和洛伦茨共同将《相持》改编成电影剧本和不开公地放映洛伦茨先驱性的记录片（1938年1月13日斯坦贝克打电报给卡洛尔：“极赞成洛伦茨事”）。

最重要的是，像她处理她丈夫所有的手稿一样，卡洛尔打印和编辑了《愤怒的葡萄》的手稿，并在前期充当了挑剔的评论者（到1938年9月末，书快写完时，她承认已失去了“分寸感”，并觉得不再适于“评论这本书”了），她还妙手高着，从朱丽亚·沃德·豪的“共和国战歌”中选定了小说的题目，或许是听了帕雷·洛伦茨的广播剧《看这可怜人》时得来的灵感，这个剧结尾处用了豪的歌编成的军乐曲。（安妮·劳瑞·威廉斯赞叹道，“告诉卡洛尔，她是取名的精灵，她又给新书取了名”。）她的促进作用在这本日记中从始至终十分明显。这一点在这本小说的一半题献中永久地记载了下来。“献给卡洛尔，她促成了这本书。”不过最终在斯坦贝克那反复无常的心中，卡洛尔快刀一样的效率，经理般的果断和剧烈的情绪波动（她也被小说的结尾以及舞台表演般地被读者接受而弄得精疲力尽）所惹出的麻烦比要解决的还多。他与在1939年中邂逅的年轻女郎格温多琳·康格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康格身上有许多斯坦贝克在卡洛尔身上感到缺乏的浪漫气质，这标志着他们的婚姻开始破裂。1941年他们怨恨地分居了，还卖掉了他们所喜爱的洛斯加托斯山中的住处（斯坦贝克风趣地称之为“卡洛尔牧场”），并于两年后离了

婚。

小说题献的第二部分，“献给汤姆，他经历了这一切”，指的是托马斯·科林斯（1897？—1961）他是小说家素材的主要来源、向导、讨论者和确切的移民资料的记录者。科林斯不仅使斯坦贝克与乔德一家和吉姆·凯西的原型相聚，他还是虚构的“草地”政府营地的经理吉姆·劳莱这一人物的原型（这一营地给备受折磨的乔德一家提供了一块绿洲，在《愤怒的葡萄》的第22章至26章有描写。）科林斯英勇无畏，足谋多智，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担任过加州南端中央山谷内克恩县的示范农场安全管理局的经理，阿尔文卫生营（在斯坦贝克1936年的旧金山新闻报告第4篇《收获时节的吉普赛人》中有描写，这篇报告是《愤怒的葡萄》的纪实性先导）是几个被选中来给迁居的农工们提供人道、干净、民主然而却是临时的住所的，这些迁居的劳工大军越来越多地从中西部的南面和尘暴带进入加州。（1935年由农场安全管理局的前身安置局规定了二十多个营地，到1940年，国会中保守派削减了新政的预算，实际上只有十五个建成或开工）。科林斯具备管理营地的奇才——他是狂热的，远见和手段兼而有之，他和斯坦贝克都属杰克逊派的民主党人，在1936年暮夏之际一见面就如故友重逢般地结下了友谊，当时小说家正在进行两年中为调查农村情况而到南方作的数次令人疲惫不堪旅行中的第一次旅行。（与大家的印象相反，斯坦贝克并未与一个迁居的农工家庭一路从俄克拉荷马走到加州。）

幸运的是，科林斯的报导写得既准确，数量又很多。他对农工们各种活动每周写一篇栩栩如生的叙文，写了各

种事件、食谱、娱乐活动、话题、信仰以及个人的观察，这给斯坦贝克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增添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补充材料。事实上，斯坦贝克与科林斯达成了一项交易，科林斯将引导斯坦贝克透过复杂的农业劳动的场面与迁居的农业工人家庭建立直接的接触，并为他提供重要的材料；作为回报，斯坦贝克不仅要自己撰文广播出去以透露工人们的困境，还要编辑科林斯的报导，并为这些报导编成书出版而创造条件。正为此目的，1936年末斯坦贝克在洛杉矶托斯的家中为科林斯引见了他的一个经纪人安妮·劳瑞·威廉斯，她正好在加州出差。威廉斯对科林斯的直率和他所汇集的“社会记实”的重要性立刻有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十八个月中她和梅维斯·麦金托什着手编书，不时与科林斯联系，随时处理补充的资料并将手稿寄往许多出版社评审。

显然，斯坦贝克越是忙于自己的东西，就越少加工科林斯编的资料，而常常将其中“大堆”的材料，直接用到书里去——总是获得科林斯的同意后才这样做的。（“接汤姆的信……他真好，我需要这种资料，很精确，要是我错了，正好可以用来矫正我的错。”斯坦贝克在日记第24则中有过这样的话。）1938年6月末，斯坦贝克已把《愤怒的葡萄》定稿写了一个多月时，他干脆不干编辑资料的事了。弄得W-W·诺顿书局只好请一个名叫马德兰·鲁斯文的作者来把科林斯的书“弄成能出版的样子”。科林斯表面上“认可”了鲁斯文的作法。但可能对斯坦贝克不信守诺言而感到很不高兴。当年9月，与斯坦贝克在洛杉矶托斯争执之后（斯坦贝克在第69则日记中写道，“汤姆